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

[丹麦] 裴特生 著
钱晋华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校订本)

[丹麦]裴特生 著
钱晋华 译
鲁国尧 侍建国 校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丹麦]裴特生(Pedersen, H.)著;钱晋华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4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5062-8744-9

I. 十… II. ①裴…②钱… III. 语言学史—欧洲—近代 IV. 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430号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校订本)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

著者:[丹麦]裴特生

译者:钱晋华

校订:鲁国尧 侍建国

责任编辑:陈晓辉

封面设计:星银河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邮编100010,电话010-64077922)

销售: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1mm×1245mm 1/24

印张:16

字数:319千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2-8744-9/H·1024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

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蒋绍愚
鲁国尧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丹青 吴福祥 何自然 姚小平 曹广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丁言仁 | 王立非 | 王初明 | 王建勤 | 王洪君 |
| 王寅 | 王超贤 | 文秋芳 | 方梅 | 石锋 |
| 冉永平 | 宁春岩 | 冯志伟 | 朱庆之 | 任绍曾 |
| 刘振前 | 江荻 | 杨永林 | 杨亦鸣 | 杨信彰 |
| 李小凡 | 李向农 | 李柏令 | 李战子 | 吴海波 |
| 岑运强 | 汪国胜 | 沈阳 | 张伯江 | 张博 |
| 张德禄 | 陆丙甫 | 陆汝占 | 侍建国 | 胡建华 |
| 姜望琪 | 祝畹瑾 | 袁毓林 | 顾曰国 | 钱军 |
| 高一虹 | 高立群 | 郭锐 | 黄国文 | 崔刚 |
| 崔希亮 | 彭宣维 | 董秀芳 | 程工 | 程晓堂 |
| 曾晓渝 | 熊学亮 | 潘文国 | | |

总策划 郭力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述论

侍建国 鲁国尧

一、引言

“如果对在你出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你就始终是个孩子。”

这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的名言。

对于当今中国的语言学家，无论是已经学有大成的知名学者，或是刚刚入门的青年学子，都应该学习、了解、研究语言学的历史。因为中国语言学人的神圣任务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基，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中国语言学》发刊辞）。职是之故，我们要学习中国语言学史，也要学习外国的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的名著之一《中国语言学史》，这是一本中国语言学的通史，是我们的必读书，因为它指引我们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先贤在语言学领域里所创造的辉煌成就。

我们也要了解、学习外国的语言学史，旨在取其精华、借鉴融通，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

这本外国语言学史的名著值得研读：丹麦学者郝尔格·裴特生（Holger Pedersen）著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这是一本西方语言学的断代史，这是一本西方语言学名家的

名著。

十九世纪的欧洲，学术很发达，产生了比较语言学，可谓之彼时彼地的显学，百载风靡，精英汇聚，名家辈出，著论蜂起，蔚为大观。

北欧的丹麦是比较语言学的策源地，裴特生誉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比较语言学专家”的拉斯克，以及后继的维纳尔、汤姆生等对比较语言学卓有贡献的学者都是丹麦人，所以丹麦的语言学有悠久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为前一世纪的语言学作全面总结的任务就落在丹麦学者、著名比较语言学家郝尔格·裴特生的双肩之上。裴特生著 *Sprogvidenskab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 Metoder og Resultater*^①，1924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版。1931年 John Webster Spargo 翻译成英文 *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thods and Results*（中文直译应为《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方法和成就》），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所有增改，见“英译者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学者钱晋华女士据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书名则为《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58年5月由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1月第二次印刷。钱晋华女士的中译本如此命名是有意

① 北京大学王超贤教授赐教：丹麦语的 *sprogvidenskab*（-en 为后置定冠词）对应德语的 *Sprachwissenschaft*，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直接理解为英语的 *linguistics* “语言学”。它们可以拆解成：

| | | |
|--------|---|--------------|
| sprog | + | videnskab |
| Sprach | + | wissenschaft |
| 语言 | + | 科学 |

后一成分还能分解为：

| | |
|--------|-----------|
| viden | -skab |
| wissen | -schaft |
| 知识 | 表示集合名词的词尾 |

义的，在近代世界史上，欧洲占了主导地位，“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2006：473）。于是形成了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欧洲学人的论著往往不加表示地区的限制词。这种欧洲中心观受到了质疑，从原书名、中译本名可见一斑。

近半个世纪以来，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一直受到中国语言学人，尤其是历时语言学的学者的重视。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郭力总编决定将《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作一次校订后出版，无疑地，这对推动中国语言学界进一步了解西学、汲取其精华、进行自主创新将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读毕此书后的感觉是，对西方的十九世纪的比较语言学，这次总算实实在在地触摸了一次。

二、关于作者

郝尔格·裴特生 1867 年生于丹麦西部的 Gelballe 镇，1953 年卒于首都哥本哈根。他早年曾到希腊西海岸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对的科孚岛（Corfu 岛，现名克基拉岛）上收集过阿尔巴尼亚语材料^①。1897 年获得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

裴特生在方法论上受新语法学派的熏陶，他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在于凯尔特语语法研究^②，代表作有《凯尔特语的比较语法》（两卷本，1909，1913，哥廷根），该书现在依然是凯尔特语比较语言学的主要参考著作。此外，他对赫梯语（Hittite，现通译为赫梯

① 裴特生曾跟随卡尔·勃鲁格曼（Karl Brugmann）去希腊的科孚岛（Corfu）收集语料，后者是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新语法学派的主要人物。裴特生的生平资料获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lger_Pedersen。

② 早期的‘grammar’主要指形态变化。

语) 和吐火罗语 (Tocharian) 也有独特的见解, 他把吐火罗语归入印欧语系。

评述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由他提出的, 并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争议的比较语言学的两种理论: 一种叫“同宗论” (Nostratic theory), 一种叫“声门论” (glottalic theory)。

“同宗”的概念来自裴特生 1903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土耳其语系的文章里使用的术语 Nostratic^①, 他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最后对“同宗语言 (Nostratic Languages) 有个定义 (见本书第 317 ~ 318 页)。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重提这个理论, 但这一理论被认为证据不足, 它们所列的同源词, 其语义关系松散, 它们的构拟也不符合类型学原则 (Campbell & Mixco 2007)。

裴特生 1951 年提出的“声门论” (glottalic theory) 是关于原始印欧语的浊塞音应为挤喉音 (ejectives) 的观点。它认为传统的原始印欧语的浊塞音系列 *b, *d, (*g^j), *g, *g^h 应为挤喉音 (ejectives) 系列 *p', *t', (*k^j'), *k', *k^h', 挤喉音由声门外挤气流而产生, 所以该理论又叫“声门论”。

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以上两个理论, 该著作是裴特生对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它科学地介绍了西方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 至今仍被列为西方语言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Joseph & Janda 2003: 134)。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 受到学界的赞许, 例如, 作者本人是凯尔特语比较语法的专家, 第二章“凯尔特语”部分却只字未提自己的名字, 对于凯尔特语动词形态的研究,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最近有一本凯尔特语法的综合研究, 其中有 240 页是专门讨论不规则动词的, 由这一事实便

^① Nostratic 相当于德语 Nostratisch、丹麦语 nostratisk、拉丁语 nostrās, 意为 ‘belonging to our country or people’。钱晋华译为“乡亲”。

可猜想整个系统的繁难复杂了。”（见本书第 56 页）

三、“比较语言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西方语言学至十九世纪而臻鼎盛的地步？这不能仅仅从语言学本身的演进脉络来解释，还需要从广阔的历史背景来体察。我们认为，其所以获得很高成就，首先在于得“天时”。中国古代有“时势造英雄”的俗谚，我们在此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十九世纪的西方比较语言学。

在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许多国家竞相寻找海外市场，东方的亚洲是他们探险的目标。1492 年，哥伦布从西班牙首次西航，意义非同寻常，当代全球史专家都将 1500 年作为一个历史新阶段的起点。从此时开始，西欧实力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向外扩张和侵略，历 300 年，欧洲人成了人类的“最先进”的“一小部分”，而将全球的“大部分”置于其统治或支配之下。已故的美国著名的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道：“大约在 1500 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连在一起的世界。到 19 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 19 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2006：473）

由于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这三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化、学术有了飞跃的发展，不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它们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

了骄人的成绩，语言科学是其中之一。

裴特生以及后来的罗宾斯等欧洲学者，在论述十九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重大成就时，就事论事，限于语言学本身的进程和因素，这是他们的不足，故略述十九世纪西方语言学的时代背景如上。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开始的一段话很精彩，很生动：“欧洲的语言科学，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还没能在古希腊罗马人已经获得的语言学知识上有多少进展。不错，在克服古人的缺点和错误上，早已逐渐地有了向前发展所必备的一些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发生什么作用。土壤是准备好了，可是注定要等到十九世纪，才长得青枝绿叶来。”（见本书正文第1页）

无独有偶，裴特生身后数十年，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物，同样的帆布和帆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纺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取代了蜡烛，并已成为只需按一下开关便可做许多事的动力之源。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2006：479~480）

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论点何其相似乃尔！

四、“比较语言学”

裴特生全书叙述的、解释的、评论的主题就是一个：“比较语言

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而裴特生的书名是《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方法和成就》，因为比较语言学是显学，所以在裴特生的心目中，十九世纪的欧洲的语言科学就是比较语言学，他将二者划上了等号。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学术思潮。

请让我们引证裴特生自己的话：“包普的小小论文可以看作我们所谓的比较语言学的真正的开始。”（见本书第 240 页）“十九世纪比较语言学，经过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充分成熟的阶段了。”（见本书第 227 页）“比较希腊语言学远比不上格利姆所建立的比较日耳曼语言学的意义重大；而且在比较希腊语言学的代表人物里面，我们也找不出一个格利姆来。”（见本书第 83 页）

在裴特生的书中也偶用“比较语法”，如“按年代说，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比较语言学专家是拉斯克（1787—1832）。他的主要著作《古北欧语或冰岛语源探讨》，堪称印欧语比较语法的胚胎。”（见本书第 231 页）

裴特生认为格利姆使用的字眼“历史语言学”，实际上是“比较语言学”。裴特生说：“除拉斯克和包普以外，在建立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里面，我们必须提到格利姆。按照格利姆自己选择的字眼，他常常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创始者，而不是比较语言学的创始者……但是这并不是追求事物根源的办法。格利姆的《德语语法》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研究，虽然他只拿一些近亲语言，或是同一语言的不同阶段，来互相比较。他的比较限于日耳曼语支的诸语言。”（见本书第 241 页）

关于“比较语言学”的内涵，我们通读裴特生全书后，摘其警策之言以述“比较语言学”的大意如下。

十九世纪西欧比较语言学家倡导的“比较语言学”，并非是将任意的两个或多个语言加以比较，而是有其特定的涵义。它指的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的比较，关键在被比较的语言的形态变化体系的近似。请读裴特生：“只是在 1814（1818）和 1816 年拉斯克和包普二

人井井有条地指出印欧语系中相距最远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后，语言学的新时代才算开始了。”（见本书第 223 页）“学者们……就把这种形态体系的近似作为语言亲属关系的准绳。”（见本书第 222 页）“语言比较的重点该放在形态变化的体系上，这是指引印欧语言学入门的北斗星。”（见本书第 97 页）

裴特生的著作对确认语言亲属关系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指出，音韵和形态的符合对于辨认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符合之点必须是语源上的一致。他说：“形态变化体系的相同是语言亲属关系特别清楚而显著的证据，这是无人否认的。可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符合如果仍然认为是唯一可靠的考证，那么在理论上这是不合时宜的，对实际应用也没有什么意义。初发现吐火罗语时，虽然当时在形态变化上并没有看出它跟印欧语有任何相似之点，但是谁也没有怀疑它是印欧系的语言。这样的相似点后来被指出来了，可是即使这种相似点已经模糊不清；从词汇和语音规律上也仍然可以找到亲属关系的证据。例如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形态变化体系的相似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谁也不会说是不可辨认的，即使不借助于其他有关的语言或是它们自己的较古的形式。”“语音演变是遵照规律的，这一点已经搞明白了，于是再没有人怀疑拉斯克早就设想的了：两个语言词汇的中心组成部分，如果受一定的语音定律所制约而互相符合，那么这样的符合也和形态变化的体系互相符合一样，足以证明这两个语言有着亲属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非得把各语言全面地，包括词汇和语法，加以系统的比较，才能得到证明。”“音韵和形态的符合对于辨认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符合之点必须是语源的。”（见本书第 227 ~ 228 页）

比较语言学认为，现知的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都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共同原始语言的后裔”（见本书正文第 2 页），比较语言学家应该有“从同一个早已不存在的语言产生了一系列平行的语言的

这一正确概念”。（见本书正文第7页）

比较语言学家史莱海尔设计出“拟构”的办法，以更好地推测、显示共同的原始印欧语的状态，这“拟构”沿用至今，详见下。

五、比较语言学率先在印欧语系的沃土上诞生

为什么比较语言学首先在印欧语而不是其它语系的土壤里产生？这是每一个企图了解或研讨语言学史的学人在初始时必然想到的问题。在裴特生看来，只有印欧语系是最适宜于比较语言学滋生、繁荣的沃土，因为它的各语言之间存在着诸多“出人意料的问题”，需要比较，且有难度，能满足学者的好奇心，有刺激性，但又“不是无法识别的区分”。

且听裴特生娓娓道来：

“希腊人或罗马人深入追究词语的起源或语言间的关系时，他们就不免走上了歧途。由于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他们不可能对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有清楚的概念。希腊文学里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可是这些方言间的差别太微小了，不能激发深刻的思考；至于外国语的研究，古代人是不感兴趣的。”（见本书正文第1页）

“拉斯克和包普二人的辛勤工作给语言学开辟了新的土地，这块土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宜于语言学的培植。谈到语言的年龄，传播领域的广阔和花样的繁多，以及语言之间深奥而并不是无法识别的区分，那么印欧语系该是独一无二的。更因为这一语系中的语言，曾经是，现在也还是文化与学术发展较高的许多民族的语言，所以所有关于它的问题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于是在这个领域内，比较语言学就毫无阻碍地迅速迈进了。”（见本书第223~224页）

“有很多理由，不可能首先在芬兰-乌戈尔语的范围发展语言学。芬鸟语群跟欧洲学者们的视野和兴趣相距过远，而其中的问题也

太难解决，因为这些语言间关系很疏远，而且古代文献非常缺乏。所以它们的问题，凭这门还在襁褓时期的科学的微弱力量是对付不了的。闪语系同样也不适于首先作为培植比较语言学的园地。这语系丰富地保留了芬乌语群所缺乏的东西——古代文献。……再说，这两种语言如今都不是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最后——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闪语系的语言不像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有着出人意料的问题，能够刺激新兴的语言学。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太容易辨识，显示得太直截了当。”（见本书第 223 页）

六、裴特生书的若干要点

裴特生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引论”之末交代了其书的组织次序，可谓之三大块：“首先要叙述的是视野的开展；接着讨论方法的演进；最后我们根据今天优越的条件，谈谈印欧语系的史前时代。”（见本书正文第 13 页）

该书有八章，再加前面的“引论”，后面的“索引”（包括主题和语词两种索引）。其中第七章“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的内容将单独介绍。现集中介绍其他各章与比较语言学有关的内容，别的内容（如文字史的研究）从简。

1. 古代的臆测和十八世纪语言材料的汇集

该书“引论”部分主要介绍西方古代的语言研究以及十八世纪西方语言材料的收集，后者可视作十九世纪比较语言学兴起的基础。

西方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在解释语源，实为幼稚的起步阶段。古代西方学者在接触古印度语言之前，对于语言的亲属关系缺乏认识，只是虚妄地猜测。虽然希腊语有古老的历史文献，但古希腊哲学家、语文学家对别的语言或者方言没有兴趣，他们以“名实相应论”来解

释词形和意义的所谓“词源学”（布龙菲尔德 1980：2），他们不了解语音演变，也不知道什么是词根，什么是词缀，以语音相似的词语随意解释语源。裴特生举了两个例子，见（1）。（见本书正文第 3 页）

| (1) | <u>词形</u> | <u>词义</u> |
|-----|---|-----------|
| a. | vulpēs ‘fox’ (属格 vulp-is) | 狐狸 |
| | = volō ‘I fly’ + pēs ‘foot’ (属格 ped-is) | 会飞的腿 |
| b. | lepus ‘hare’ (属格 lepor-is) | 兔子 |
| | = levis ‘light’ + pēs ‘foot’ | 捷足 |

他们把（1a）“狐狸”的词形当成由“飞”和“腿”的合成，把（1b）“兔子”的词形看作由“轻捷”和“腿”的合成。

更为可笑的，他们甚至以语音相似但性质相反的词语解释语源，如（2）。（见本书正文第 4 页）

| (2) | <u>词形与词义</u> | <u>词源</u> | <u>解释</u> |
|-----|--------------|-----------------|-----------|
| a. | bellum “战争” | 来自 bellus “美丽的” | 战争是不美丽的 |
| b. | foedus “和平” | 来自 foedus “丑恶的” | 和平不是丑恶的 |

所以，裴特生说：“古代世界给欧洲留下了一笔遗产，里面装满了对语言史的误解；欧洲的语言科学就背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见本书正文第 4 页）

到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s）根据当时的材料提出一个语言谱系假说，认为大多数欧洲和亚洲连同埃及的语言，都是同一个原始语言的后裔。不同语系之间也许存在亲缘关系，比如他观察到，在波斯语里能找到的日耳曼语成分绝不比在希腊语里能找到的多，而十六世纪以来的一个普遍观念是波斯语与日耳曼语有特别的亲缘关系。（见本书正文第 6 页）

莱布尼兹的假说给予学者很大的启示，人们纷纷收集材料，沙俄女皇卡特林二世对此也很有兴趣。由于她的积极关注，十八世纪后期出现了一部包括欧亚两百多种语言的汇编，此后增加至三百多种语

言。这种大规模的语言材料的汇集，结束了早期学者对词源的极端幼稚的谬误，同时也为十九世纪历史语言学的革命性创举奠定了基础。

然而，材料的汇集并不一定能产生正确的方法。裴特生说，语言材料大规模的汇集“需要方法，需要原则，给这浩瀚的材料作合理的分类”（见本书正文第 12 页）。欧洲学者只有接触了古印度语言，看到了它的古老性以及形态变化的规则性，才认识了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科学，才开始进入科学意义上的比较语言学阶段。对此，裴特生以愉悦的口吻描述欧洲语言学的新曙光：“蝴蝶终于从它的茧子里钻出来了，因为它在蛰伏的冬眠状态里已经经历了相当时期的生长了。”（见本书正文第 12 页）

2. 古印度语言的价值

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是关于印度语和伊朗语的研究，我们主要介绍古印度梵语对西方历史语言学的重要影响。

古印度的文献资料可追溯至公元前 1500 年甚至更早的经文《黎俱吠陀》（Rig-Veda）。裴特生认为，古印度人能完整地保存文献，归功于“他们在极细微的发音差别上都是一丝不苟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则宗教的祭祀就不能产生善果，甚至反会惹祸”（见本书正文第 15 页）。吠陀语是神圣的经文；而民间文学材料如史诗、抒情诗、寓言、哲学论文等，则用一种古典梵语（Sanskrit），它与吠陀语略有不同。

古典梵语很快成为一种雅言（learned tongue），并由婆罗门教徒一直保存至今。它何时不再是活语言，难以确定；直到公元前 300 年印度语法学家波你尼（Pāṇini）的时代，梵语在某些阶级依然通用。而这时老百姓的语言已经是 Prakrit（也称“俗语”），它是印度古代及中世的一种方言口语，公元前 250 年阿育王的铭文就是这种语言。在印度戏剧里，一般上层男子讲梵语，下层人或妇女讲 Prakrit（见本书正文第 15 页）。

自 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绕道非洲到达印度的

航线，欧洲人就开始接触到当时印度的圣语——梵语。梵语在印度的地位，如同拉丁语在欧洲中古时代（五世纪至十五世纪）的地位，欧洲学者自然对梵语产生浓厚的兴趣，结果发现梵语与欧洲语言有惊人的相似。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有段话^①，被誉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开创之言，现将它翻译如下：

“梵语，不管它的古老形式怎样，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完整，比它们二者更精美；它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将希腊语和拉丁语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偶然性绝对解释不了；比较此三者的任何一位语文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来自同一源头。当然，这一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以同样的方法，尽管不那么有说服力，可以推测哥特语和凯尔特语，尽管二者融合了一种很特别的风格，它们与梵语有共同源头；如果能够讨论与波斯语古老性有关的任何问题，那么古代波斯语也加入这一家庭。”

裴特生认为琼斯的这段话非常精辟，同时也指出它的局限，即把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与梵语之间的差异看作由于前两种语言掺混了一种很特别的言语成分，看来琼斯的这个观点还没有脱离旧思想。（见本书正文第17页）

德国诗人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首先明确提出了“比较语法”（comparative grammar），他在1808年出版的《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一书中比较了梵语和欧洲古典语言，对“比较语法”的意义这样评价：“比较语法可以使我们对语言系谱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认识，它和比较解剖学使自然历史大放异彩有异曲同工之妙。”

^① 威廉·琼斯1783年至印度，任英领印度加尔戈达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1784年创立加尔戈达亚洲学会。这段话出自他1786年在学会所做的“印度学三周年纪念演讲”大会发言，本文作者译自Hock（1986：556）。这里没有引用钱晋华的中译文，因为该段的英文原文前后还有两句，即“梵语，不管它的古老形式怎样，它具有奇妙的结构”，以及“如果能够讨论与波斯语古老性有关的任何问题，那么古代波斯语也加入这一家庭”。